

中国文化思辨： 从文学走向传播

朱剑飞 著

中国新文化传播书系

中国文化思辨：从文学走向传播

朱剑飞 著

广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文化思辨：从文学走向传播 / 朱剑飞著 . - 广州：广州出版社，2002.8

ISBN 7 - 80655 - 406 - 8

I . 中… II . 朱… III . 文化 - 研究 - 中国 IV . 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4949 号

中国文化思辨：从文学走向传播

广州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广州市人民中路同乐路 10 号 邮政编码：510121)

韶关二九〇研究所地图彩印厂印刷

(地址：韶关市工业东路 33 号 邮政编码：512026)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字数：27 万 印张：13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李利 戴晓莉 责任校对：王唯

发行专线：020 - 81924658 020 - 83793214

ISBN 7 - 80655 - 406 - 8/B · 19

总定价：180.00 元（全九册）

总序

没有传播的文化是凝固的文化，没有文化的传播是无价值的传播。当新世纪的曙光拂耀在世界文化之林的绿色树梢，那发明了活字印刷传播术的中国文化，在渴望和平发展的亿万人的热切注目中，仿佛正幻化成全球文化市场经济条件下，追求崇高人文精神的一道亮丽风景。

穿越风烟弥漫的遥远古代疆场，中国文化向我们蹒跚地走来：由浑浑茫茫、一统天下、包罗万象的总系统开枝散叶，又在百家争鸣中明辨是非，消解歧见，兼容共存，延续了由顺应自然的道家、立法强国的法家、崇仁尚礼的儒家所弘扬的民族文化血脉，在东方大地燃起了世界文明的辉煌……

脚踏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征程，中国文化向我们阔步地走来：在国际风云的急剧变幻和血火考验中，培育了一个个革命的先行者和无畏的改革家，有赖于他们前赴后继的上下求索，掀起了当前经济文化建设的热潮，在全球文化的视野中沉思远眺，批判剖析，描绘着未来社会的壮丽宏图……

跨过诗意图升华的新文艺建设工地，中国文化向我们矫健地走来：敏锐触探大时代的脉搏，精心塑造生动鲜活的形象，高声呼喊亿万民众的赤子之心，愤怒鞭挞丑恶的社会现象，无情抖落腐朽文化的灰尘污秽，创造出了无愧时代、彪炳史册的精美艺术……

批史阅著，治实务虚，若以信息论看，中国文化犹如气象万千、

丰富多彩、无穷无尽的知识海洋；若以系统论看，中国文化则像一株根深蒂固、枝繁叶茂、学科系统的参天巨树；而若以控制论和非线性思维的眼光，站在历史与美学的高度仰望，那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是由中华民族健儿齐心托起，喷薄而出，和光同尘，兼容百家，在减熵增序、去旧生新、与时俱进的浩瀚宇宙中，照耀寰球，熠熠生辉的一轮朝阳！

面对中国文化，这热力无穷、光芒四射的人文巨日，这源远流长、浩瀚奇丽的智慧海洋，这集英撷粹、美不胜收的知识园林，我们怎能不鼓励，不争做那无畏的勇者，去拨开那历史的迷雾，去冲破那僵化的陈说，去探寻那理想的奇葩呢？

我们不强求本书系人人立论稳妥周全，更不奢望个个阐述得尽善尽美，但力求为中国新文化建设添砖加瓦，传播新知。我们深知在当前顺势而起的汹涌澎湃的市场经济大潮似乎要冲淡一切人文价值和美好理想的时候，努力高扬人文精神和坚持理想信念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因而主张殚思竭虑，各抒己见，不拘一格，实事求是。也许正是从孔说老学的一句真言辨析里，我们可发现瑕不掩瑜的东方巨子的睿智灵光；也许正是从领袖先哲一生奋斗的坎坷足迹上，我们可领悟那知难而进的民族精英愈挫愈奋的坚韧意志；也许正是从中外大众文艺形象系列的审美观照里，我们可感觉中华民族那积蓄千年而终于乘势腾飞的伟力之源！

立足中国大地，呼唤真知灼见，传播先进文化，高张理想旗帜。

这就是广东省文化传播学会同仁精心策划，与有志者携手推出这套中国新文化传播书系的目的。

2002年2月23日

目 录

文学篇

| | |
|------------------------------|------|
| 历史的反思需要勇于面对自我 | (3) |
| 浅议中国当代文学专业教材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评 | (8) |
|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教学所遇问题的几点思考 | (25) |
| 不可遏阻的文学新潮：中国现代主义 | (29) |
| 当代中国文学现代主义存在观刍论 | (34) |

传播篇

| | |
|------------------------------|-------|
| 广东电视文化建设发展观 | (95) |
| 广东电视台十年改革巡礼 | (115) |
| 关于广东电视台近期改版栏目社会反映的调查分析 | (144) |
| 社会主义电视节目走市场化的道路势在必行 | (155) |
| 发挥广东窗口作用 繁荣社会主义荧屏 | (164) |
| 关于我国电视在开放格局中的若干思考 | (176) |
| 栏目制片人制对中国视坛全方位的撞击 | (192) |
| 试论研究室在中国电视媒体中的地位与作用 | (210) |
| 世纪转折时期广东电视文化的建设与发展 | (222) |

| | |
|--------------------|-------|
| 《春风绿南粤》的精品意识 | (244) |
| 在两难抉择中奋起 | |
| ——中国电视发展前瞻 | (248) |
| 上海广播电视台集团化发展思路的启示 | (269) |
| 中国电视媒体产业集团化进程的若干思考 | (280) |
| 中国电视发展的战略选择 | (294) |
| 困惑与希望 | |
| ——中国电视产业集团化的难点探索 | (299) |
| 乘风破浪——WTO与中国电视 | (319) |
| 南方：电视人的精神家园 | (333) |
| 后记 | (336) |

文

字

篇

历史的反思需要勇于面对自我

在对建国以来文艺思想发展史的回顾与估价中，没有比对胡风文艺思想的重新审视更让人感到困惑不解和难以诉诸公论的了。1980年10月，胡风在政治上获得了平反，但当年作为定罪凭据的胡风文艺观及其思想性质基本上没有得到正面的认同，而在这前后出版的系列专业教材对之的评价，大体上还保持20世纪50年代的结论。直至今天，那些随着思想解放和认识深化而带来的成果，也难以被新近出版的教科书公开容纳与大胆吸收。一些正在修订的专业教材，即使明白胡风文艺思想在整体上将得到重新肯定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但惧于某些“把关”者的脸色，或一拖再拖，无从下笔；或诉诸曲笔而露难言之隐；要不就是张扬合理，条分缕析，头头是道，但结论却言不由衷，追问其由，只能是“尊重历史现状”，别的概不奉告。曾记否，待饱经沧桑之痛后的暮年，胡风又终于有了歌唱的自由和申辩的权利，他为兴致所趋，曾写下了“沧桑终易地，世路已逢春”这样赞美时代的诗句。只是当他诀别令他万分依恋、却也是难以回首的尘世间的时候，他还是留下了终身的遗憾——他未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惨淡经营的思想成果于人于社会重获所应有的公论；他更没有想到他的追悼会是在自己逝世半年之后才最终得以举行，尽管悼词中给予他一生的评价是那样的堂而皇之。对此，海外一些评论家直接表示困惑不解，并给予关注，至于我们，能说这是对历史的尊重可引之为豪？还是愧言于个人以往的恩恩怨怨，而借着冠冕堂皇的辞藻在大做当年言犹未尽的宗派文章？看来，对胡风文艺思想这份文化遗产的重新审视，不但需要历史的甄别，时

间的沉淀，实践的检验，而且更需要的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所能给予的坦荡胸怀。这样，当对历史的沉思达到一定深度的时候，我想，谁都不会甘于沉默并拘于后怕的。

目前，对胡风文艺思想的重新估价大多偏低，主要在如下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或未能突破旧有的认识水平，或耻于承认过去认识的肤浅与失误。

在什么才是艺术创造的源泉的问题上，胡风历来坚持作家创作就是主观精神（创造力量）和客观现实（创造对象）经过相生相克斗争后，在更高意义上结合而形成艺术产品的观点，因而理所当然地把作家那种“对于客观现实的把握力、拥抱力、突出力”的“主观战斗精神”当作了“艺术创造底源泉”不可或缺的部分，并予以强调。多年来这一直为人们引注归谬，认为这是胡风公开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关论点唱反调，并由此引出胡风在世界观方法论上“颠倒了存在与意识、客观与主观、社会实践与精神作用的关系，宣扬了主观唯心论”的结论。其实，胡风的观点倒是正确反映了艺术是如何产生这样一个主客体统一论的问题，它既符合具体的创作实践，同时也使得它能有别于并纠正以往颇为流行的机械反映论，因为它意识到了作家光有生活还不能产生作品，其中还隔着这么一个“冶炼合金”、“蚁酸酿蜜”的制作过程。就现实而言，并不是有着丰富生活阅历的人就能称之为作家的。因为在没有审美感觉和审美能力的主体面前，客体谈不上成为审美的对象，而且主体审美能力的高下，又总是制约规范着审美对象涉及的范围和内容发掘的深度。而衡量一个优秀作家，其主观能动方面，除了必须具有能突破世俗常规、传统偏见的束缚，身蕴巨大的历史透视力和预见性，善达物我两忘、人我合一、心灵大自由境地这样的超越意识及其素质特征之外，还得富有为天下忧的深广的忧患意识和无畏的斗争意识。而我们过去的文艺理论批评，确实有忽略或轻视主观能动作

用和主体修养的偏向：常常仅从认识论的角度去解释经典著作的有关论证。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主席是从哲学意义上来说生活是文学艺术的惟一源泉的，而胡风的观点是从另一个角度、另一个层次上而言的正确命题，所以硬要把两者作机械对比，必然会把审美等同于认识，造成对艺术创造过程的揭示缺乏层次感、纵深感。自然，望文生义，认识皮相，不免把问题简单化、绝对化，从而也把胡风创作论中的“主观战斗精神”“漫画化”了。可以说我们过去批判的本身就欠科学性。

强调通过创作实践和运用创作方法来达到掌握马克思主义、促进作家立场朝无产阶级方面转变，是胡风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他看来，指导文艺的正确理论，也是来源于创作实践，“是从文艺发展史上得出来的原则性的东西”，因此他要求作家对正确理论，重在实践中的把握，是化为血肉在质的意义上的真正领会；而认为理论本身的意义，既表现在对创作力的引导上，也呈现出在创作实践本身的制约下面有发展的必要和趋向，因为它本身也是第二性的东西。论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现实主义之所以有相通处，这是因为前者首先要求我们不带偏见如实地去认识生活和反映生活，并指出掌握先进思想的革命阶级的利益是与生活的客观进程相一致的。而这种具体的要求和现实的特点，正是后者所包蕴的内容和它自身潜藏的优势。而肯定现实主义具有弥补世界观的缺陷的功能，这是因为作家的创作实践作为生活实践的继续和延伸，在严格遵从现实主义美学原则的创作主体那里，会成为比它前身更为自觉、更为主动的审美过程。实际创作中出现的作家愈是处于主动状态，而在自己的人物面前愈是处于被动状态的二律背反现象，就是令世界观决定论者们尤感困惑的命题。过去流行的看法都认为胡风这些实践的观点是在夸大创作方法与世界观的矛盾，抹煞共产主义世界观对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指导作用，并进而引申出胡风是别有用心，是在“反对学习马

列主义”的结论。这在今天尤其值得我们反省，且不说是在曲解他人，起码还得承认，我们的认识还是失之肤浅，免不了又染上庸俗社会学的色彩。

在传统文化问题上，把民族虚无主义的帽子扣在胡风头上，实在是令人遗憾之举。所以胡风在其《评论集》后记中对此要一再申辩多方表白。胡风是把五四以前包括“民间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学冠之以“封建文学”的，但他并没有否定其中那些“还不大发达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只是从整体把握的角度，把它们当作其中构成成分统归于封建意识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尽管字眼上令人忌讳，但实质并没有与列宁关于“两种民族文化”学说相离异，而且这种归纳也就是建立在古代文化遗产中“糟粕多于精华”这个符合历史实际的正确观点之上的。而我们却由此简单地得出胡风是把五四以前的文化都当做“一概不能要”的“封建文化”的结论，一方面，归谬的结果变成自我的归谬；另一方面最终也不免落入国粹主义窠臼。胡风对待传统文化在总的認識上持扬弃的观点，并有较为系统的理论阐述。吸取营养，他强调的是借鉴和主观能动地批判改造这两个原则，主张借助现实主义的方法即主客观的有机交融来化精华为己有；而对于如何才能够创造出“反映新民主主义的内容”的“民族形式”，胡风坚持“以现实主义的五四传统为基础”，通过把握民族现实，加强接受外来经验这两个途径来达到目的。从中我们是很难引出他的見解是“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无共同之处，与我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也不符合”的结论来的。在内容与形式关系的问题上，当年胡风有感于旧有形式对表现激烈动荡的现实斗争生活内容的先天不足，而新的民族形式还无法即时应运而生，故依循形式創造的“外砾”原则，把较多的目光在对象上移至现实，在方法上转向外来形式的移植、借用，而且是把这借用、移植限制在与本民族的生活现实相适应，尤其是在国际革命文艺的经验或方法这

范畴上，并非不加选择、盲目引进（这也正是马列主义输入中国能获得成功的原则基础），这种做法尽管有囿于过多强调内容决定形式而显偏颇的一面，但我们起码应予之理解，并要看到无论在政治上还是文学上的变革时期，常常是不宜过分强调传统继承这样一种历史现象，从而应对胡风采取比较宽容和实事求是的态度。

检视以往，历史已经留下了这样的一页——胡风，“没有第二人像他这样”，是从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就一直坚守在文艺批评岗位上，为人所公认的文艺批评家，长期的职业熏陶和对文艺本身规律特征的精研探讨，加之在革命阵营里的锻就，使得他由此而形成的文艺思想，在许多方面较之我们（当时不少人在文艺理论批评方面一是受从属政治这庸俗社会学的影响，二是对于文艺创作过程本身的美学探讨失之肤浅的状况）显得深刻独到，而从其遭受到的尤为不公平的特殊境遇去看，他的执着又是那样难能可贵。今天，面对他留给我们后人这样一份值得继承借鉴的宝贵精神财富，是让它继续蒙垢沉沦，还是为之拂尘净土，光耀于后人，我想，我们今天对此所需要的，更多的还是来自我们自身的深刻反省……

浅议中国当代文学专业教材 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评

蒙垢的历史，总有还其庐山真面目的日子。当打开眼前这几套近年来陆续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面对其中就同一个文艺批评家却各自有着戏剧般变化的评论文字的时候，上述这种感觉尤其来得强烈。30多年来，自为一格终成系统的胡风文艺思想，伴随着政治斗争的风风雨雨，经历了那么一段相当长的众口铄金的坎坷路程，今天，它到底还能在多大程度上展现出它应有的价值呢？都道历史无情，而历史也最有情。在饱经沧桑之痛后的暮年，胡风又终于有了歌唱的自由、申辩的权利。只是当他诀别令他万分依恋、却也是难以回首的尘世间的时候，他也留下了终身的遗憾——他未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惨淡经营的思想成果于人于社会重获所应有的公论。而于我们，却又多了一个棘手的新课题——对这份文化遗产的重新审视。它需要历史的甄别，需要时间的沉淀，需要实践的检验，但首先更需要的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所能给予的坦荡胸怀。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胡风文艺思想随着它的酿造者在政治上的倒霉也沦为敌论而遭众口诛之，如今“沧桑终易地，世路已逢春”，当我们对此反思之余，如何作答？看来只能说我们原有的认识很难超出历史所给予它的局限，即使是教材，亦毫不例外。以复旦大学为首的20所院校合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是粉碎“四人帮”后出版最早的专业教材，它问世于党中央为胡风平反之前的1980年5月，在对胡风文艺思想的评价上，它基

本停留在 20 世纪 50 年代所作出的具有错误性质的定论基准线上，所以，即使胡风本人狱中获释，但他的文艺思想的性质仍是“反动”的，“唯心主义”的。稍后北京大学出版的《当代文学概观》，基于多种原因，没有正面对 17 年来的文艺思想斗争及运动作出系统的评述，但是，我们已能透过它对胡风提倡的“写真实”这“旁门左道”的高度肯定，多少感受到了思想解放的春风对多年禁锢了的理论禁区的无畏挑战。终于，1980 年 10 月 3 日，党中央在政治上为胡风平了反，从而也带来了在胡风文艺思想这块讳莫如深禁地的连锁反应。当时评论界已有这几种代表性的观点：第一是“批过头”，即胡风文艺思想有错误，值得批，但过火了；第二是“进错门”，即批胡是对我们自己的一次戏弄，虽然胡风文艺思想并非全部正确，但他所坚持的要从实际出发写生活、写真实，重视作家创作实践，却基本上是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的，而非唯心论；第三是“批胡有害论”，即认为当年对胡风的批判是错误的，它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极为有害，并认为，建国以来的现实主义就是从批胡风开始走下坡路的，其恶果主要体现在反对写真实、片面强调世界观的作用和忽视艺术规律这三方面上。这样，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几套当代文学教材，不能不对之有所反映和有所选择。当然，基于教材的特点，当时政治氛围以及人们意识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这些信息反馈的归宿点，只能落在第一种观点上。然而，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尔后相继出版的教材，对胡风文艺思想所下的结论，在措辞上不是没有变化的。1980 年 12 月第一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初稿》里，胡风是作为一个“具有浓厚小资产阶级思想”文艺批评家的面貌出现的，其文艺思想还是处在“小资产阶级顽强的个人主义世界观”的范畴内。到了 1983 年 9 月第一版的华中师院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简称华中本）里，胡风文艺思想以往的限制语已被其“渊源比较复杂”，马克思主

义文艺理论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艺思潮影响“二者混杂，互为表里”所代替。直至 1985 年 6 月版的江西公仲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编》，胡风文艺思想值得批评的部分，选用了“某些”一词，从而在宏观整体的把握上，又较前者更深入、更切实一些。应该看到，尽管这里所提到的教材是越往后，胡风文艺思想合理部分越得到重视和张扬，但是，在大前提没有更改的情况下，因之所产生的与结论矛盾的状况就越大，从而也就形成了人们认识上感到困惑不解的一个焦点和教学上的一大难点，到头来，人们会对自己所定下的结论提出质疑，要求重新检验，这不能不说这是预料中的事情。果然，随着 1986 年 1 月 15 日胡风追悼会在他逝世半年后最终得以隆重举行，胡风战斗的一生也得到了党和人民的肯定和赞扬，对其文艺思想的重新认识，又有了一个新的起步。检视历史，反思人生，“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要重复错误”，当年周恩来总理这一谆谆教诲，于我们今天仍有很大分量。作为专业教学工作者，我们是需要以动态的目光去面对现实，去认识真理的，而且还更应该有勇气去正对自己工作中所遇到的矛盾与困惑，当实践已证明，我们以往的教材对胡风文艺思想所持观点确实已有商榷必要的时候，我想，令我们深思的结果是不会甘于沉默的……

对胡风现实主义创作论的重新理解

能有机会拜读到三大卷本的胡风评论全集，这还是不久前的事情。为此，也给了我们系统全面地重新认识与评价胡风文艺思想的可能。我们能归结为胡风现实主义创作论思想核心的，大概就是胡风本人从创作的主体角度出发一再倡导的，即要求人们尊重感性机制的艺术规律，强调并阐明作家在创作实践中对所反映的现实生活必须具有主观能动作用的观点。在胡风看来，艺术创